

研究論文

# 新媒體語境下黨媒的傳播調適與 「文化領導權」重建： 對《人民日報》微博的研究(2012-2014)

李艷紅、龍強

## 摘要

本文考察了自社交媒體興起以來，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所創建的帳號「@人民日報」。在本文中，我們將其視為中國執政黨調適的一種表現，是自新媒體興起對傳統政黨宣傳體系構成衝擊、造成「傳播失靈」之後進行的一種反應性創建。本文的任務即是要考察，這一作為結構性調適之傳播平台的創建究竟是否、以及如何體現了傳播模式的調適？它如何通過調適來解決滿足民眾訴求與滿足黨國訴求之間的內在衝突？如何對這一調適進行解讀？通過考察人民日報微博在兩個議題：拆遷議題以及農民工議題上的表現，本文發現，其在新聞報道範式、修辭模式和話語內涵上均進行了策略性調適。通過吸納和依托社交媒體平台的技術屬性，人民日報微博創造出

李艷紅，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研究興趣：中國新聞業研究、傳媒與社會抗爭、新媒體賦權、政治傳播等。電郵：liyanhong98@gmail.com

龍強，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生。研究興趣：健康傳播、政治傳播。電郵：longq2014@126.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9月20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6月16日。

了一種以象徵性的「正義表達」為核心、以情感激發為訴求，以民粹話語的表達為出口的策略性傳播模式。這一模式得以幫助執政黨在開放和回應民意的同時增強政體的合法性，重建黨媒的文化領導權，從而暫時化解民眾訴求與黨國訴求之間的內在矛盾。正是通過創造這一平台與模式，並與核心黨報的典型角色互補，執政黨得以構築一個雙層化的傳播體系。這一傳播調適因而也構成了增進中國「彈性威權政體」的因素，但是這一取得了暫時性平衡的傳播模式是否可持續，仍有待觀察。

關鍵詞：政黨調適、人民日報微博、黨媒、文化領導權

---

Research Article

## **Reconstructing Hegemony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e Weibo Account of *People's Daily* and its Communicational Adaptation (2012–2014)**

Yanhong LI, Qiang LONG

---

### **Abstract**

Herein we present a case study on the micro-blog account of *People's Daily* (@PD), the CCP's central newspaper in Sina Weibo. We see the emergence of @PD as the party'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new forms of media, and recognize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party propaganda system.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such news platforms represent the adaptation of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if so, how. We also sought to interpret the observ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rty adaption. By analyzing @PD's coverage of two important issues, we found that @PD makes strategic adjustments to both their coverage paradigm and rhetoric modes, as well as discourse connotation, revealing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l that can solve the internal conflict that arises from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party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is communication model—utilized in conjunction with more traditional modes of party communication—the party is thus able to establish a two-tiered communication system aimed at re-establishing its hegemony in a

---

Yanhong LI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hinese journalism studies, media and social conten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Qiang LONG (PhD student).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health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realm. This adaption of party media can be seen as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regime.

**Keywords:** party adaptation, *People's Daily's* micro-blog, party media, cultural hegemon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 Y., & Long, Q. (2017). Reconstructing hegemony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e Weibo account of *People's Daily* and its communicational adaptation (2012–2014).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9, 157–187.

## 致謝

本文是教育部2014年規劃基金項目「嵌入性共生：1990年代以來新聞與公關職業的雙重演進及危機」（項目編號1402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及編輯部提出的修改意見。

在政治學研究中，政黨調適 (party adaptation) 指的是政黨組織為適應環境變遷對自身進行持續調整和變遷的動態過程。與早期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缺乏調適性特徵並且無法調適的觀點不同，今天的政治研究學者傾向於認為，80年代以後的中國執政黨正在逐漸顯示出調適的特性，成為一個具有調適性的系統，將自身創建成為「對社會不同領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有反應性的政治系統」(沈大偉，2012；趙鼎新，2013；趙建民，2010；Dickson, 2000; Xie, 2008)，並由此而增加了政體的彈性 (regime resilience) (Nathan, 2003)。

但是，關於中國政黨調適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政治學領域，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政黨體系對精英的吸納、組織的重建、擴張與內卷化，以及制度建設等(劉朋，2013；趙建民，2010；Dickson, 2000; Zhang & Guo, 2012)。在現有關於政黨調適的文獻當中，關於作為政黨體系之重要組成部分的黨的傳播和宣傳體系及其話語構成如何調適，尚未得到充分重視。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宣傳和傳播體系一直處於調適之中，是這一調適性政權系統的組成部分，我們在本文中將其稱為「傳播調適」。這種傳播調適既涉及結構和制度層面，如傳播平台的新建、傳播體系的重構以及管制政策的變遷，也涉及話語層面，如意識形態的重構。但是，在現有傳播學者的研究中，對這一傳播調適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市場化傳媒這一部門，而對於由各級黨委機關報為核心所構成的黨媒體系的觀察則較少，傾向於認為其議程不變，對其調適的認識不足。

本文將首先通過文獻梳理來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宣傳體系，尤其是黨報在其結構和角色上做出的調適，然後將把視線投向21世紀新媒體興起的背景。21世紀以來，互聯網興起，尤其是社交媒體興起對中國政權的領導力構成了衝擊，中共即開始努力對自身的宣傳體系予以調適，以使之更加適用於新興的媒介生態，這包括，加強對新媒體輿論場的監管，為黨媒建立網站和社交媒體帳號等。中共中央核心報紙《人民日報》創辦自己的微博帳號即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是執政黨力圖在新媒體的「眾聲喧嘩」中發出自己聲音的一種努力。本文希望以之為個案，結合多種研究方法，來為理解中國執政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傳播體系和模式所行使的調適與變遷提供觀察。這一觀察將豐

富我們對於當代中國傳播模式的認識。

## 中國黨媒的調適與文化領導權重建

傳播學者對改革開放後中共傳播體系和話語的變遷予以了較為豐富的考察，不過，在傳播學者的文獻中，理論資源主要並非上述的政黨調適概念，而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hegemony) 概念。這些文獻對於我們理解作為政黨體系之組成部分的傳播體系的調適具有意義。

傳播學者們發現，中國執政黨在改革開放以來其實一直在不斷調適其傳媒體系，以應對市場化機制被引進所帶來的衝擊。隨著市場化報紙的興起，中國的報業結構逐漸變得多元(Wu, 2000)，市場化報紙的興起拓展和表達了如信息傳達和輿論監督等新興的媒介角色(Pan & Chan, 2003)，也衝擊了傳統黨媒為核心的「命令型」(commandist) 宣傳體制(Lee, 1990)，使得後者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率。因此，儘管作為執政黨對傳媒體系之控制核心的黨媒是其中變化最為緩慢的，其也在經歷逐漸的調適。<sup>1</sup> 而這些調適的核心，正是對市場化衝擊的一種有意識反應，其目的則是幫助執政黨在遭受危機和衝擊之時實現文化領導權的重建。這種調適涉及結構、制度、角色和話語等多個層面。

首先，在媒介政策及對媒介角色的定義上，儘管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一直被認為是黨媒的核心角色，執政黨還是在過去的改革開放年間不斷嘗試調適和擴大其傳統角色並調整其媒介政策。例如，反映民意，而不僅僅是黨的意志的觀點逐漸被接受，媒體不僅被視為是黨的喉舌，也開始被視為是人民的喉舌(李良榮，1995)。「輿論導向」、「輿論引導」這樣的語彙開始被政府運用來定義黨報的角色和功能(羅以澄、姚勁松，2012)。黨媒不再一味致力於採用硬性的方式告訴民眾怎麼想，而是轉向致力於如西方經典傳播理論所言的「議程設置」，一方面開放媒體對民眾聲音的表達，與此同時則讓黨仍然主控媒體的聲音(Chan, 2002, p. 48)；儘管會對其監督的力度、事件和對象性質等有所限制，黨媒自己也被允許承擔一定的輿論監督功能(Chan, 2002, p.

48)。以地方黨報為例，學者們還發現，黨媒的角色和職能已經從傳統的「宣傳喉舌」轉向了「黨營輿論公司」，地方黨報不再以意識形態的宣傳、「洗腦」和改造民眾為首要角色，而是開始以推廣黨的政策和利益為己任，主要目的是營造政治輿論——提高黨的形象和強調統治的合法性（何舟，1998）。在學者們看來，黨媒之所以願意容納並對「人民的聲音」做出妥協，是因為黨認識到傳統的宣傳已經不再奏效，需要探索新的方式來建立領導權。例如，黨媒通過輿論監督式的節目，確實形成了一個有助於幫助黨建立自身形象的「形象建構工程」（Chan, 2002）。

在結構層面，面對市場化帶來的報業結構的碎裂化和去集中化，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共則展開了報業整頓並開啟了以黨報為核心的集團化進程，這一進程即可視為黨媒試圖進行結構性調適的表現和結果。通過建立以黨報為核心的報業集團，將市場化報紙通過整合合並等方式置於黨報集團之下，成為其子公司，黨報得以對分散化的報業結構進行整合，並重新確立自身在報業系統中的領導地位（Lee, He, & Huang, 2006; Zhao, 2000）。

在話語層面，當面臨黨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話語斷裂危機（如農民和農村被經濟發展「拋棄」）之時，執政黨也不斷通過重新發明新的話語包，或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召喚等來對其意識形態予以重構，以縮小社會現實和傳統意識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斷裂並合法化這種斷裂（如農村發展大大落後於城市的問題）（黃典林，2013；Song & Chang, 2012）。「明顯的宣傳主義實踐」（propagandist practices）讓位於一種內在緊湊的意義架構的實踐（framing practices）（Song & Chang, 2012, p. 334）。

但是，儘管黨媒有意識地進行了如上調適，它始終未能解決一個困境，那就是，無法解決滿足其基本角色（宣傳和輿論引導）與滿足民眾需求二者之間的內在矛盾。一旦履行黨所賦予的宣傳和輿論引導的功能，它就會讓民眾覺得官氣十足而敬而遠之。而如果一味滿足民眾興趣，立足於表達民怨，它則會偏離黨所賦予其的角色軌道。黨報在近些年閱讀率的迅速下降就是一個表現。中國記協2001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全國31家省級黨報的年均發行量從1990年的31.49萬份，跌至

1999年的23.91萬份，黨報的讀者群中，經常閱讀黨報的人只佔35.02% (劉梓良，2001)。這些都說明，黨報黨媒對於民眾的吸引力大大減弱，使得黨報的聲音難以傳達到民眾，其所承擔的種種角色和使命因而也失去了現實基礎。這種危機在1990年代中後期即開始被黨媒的觀察者注意到，並被表述為「兩個輿論場」的衝突(南振中，2003)：老百姓的口頭傳播其實構成了外在於黨報的一個「口頭輿論場」，或稱「民間輿論場」，形成了與黨報黨刊所構成的官方輿論場截然不同的關注、興趣和看法。

當然，在過去這些年，上述的二元衝突曾經在一些具體的案例中得到過暫時的解決。例如，1990年代中央電視台曾經通過《焦點訪談》節目引入輿論監督這一節目形態，曾經贏得了民眾與執政黨的雙重支持(Chan, 2002)。但是，上述模式在新世紀陷入了困境，隨著《焦點訪談》逐漸回歸傳統的宣傳角色，它逐漸失去民眾的支持(莊永志，2013)，同樣陷入了沈大偉(2012)所說的調適與收縮的再循環。

## 新媒體時代的危機與人民日報微博的誕生

兩個輿論場的衝突在在新媒體時代更加突出。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BBS、QQ和博客等具有互動性特徵之新媒體被廣泛應用，中國民眾越來越多地在這個外在於官方宣傳體系之外的場域進行時事和公共事務的傳播和討論，形成民間輿論的主戰場，其與官方輿論場之間的分化日益顯著。這給中國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帶來諸多危機，並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後表現更加深重。這包括：導致了「傳播失靈」，即黨的輿論引導能力迅速削弱的問題(潘祥輝，2012)；導致了兩個輿論場割裂，即民間輿論場的強勢崛起與體制內輿論場逐漸邊緣化的問題(祝華新，2012)；與此相關的還有執政黨的話語權危機，公共話語的解放弱化了執政黨設置公共議程和形塑政治傾向的能力(Esarey & Xiao, 2011)；隨之而來的是治理成本的增加及對執政權威的挑戰等的問題(Noesselt, 2014)。

這些都給執政黨提出了艱巨的調適任務，如何建立新興的傳播結



構，調適舊有的傳播結構，並在這一新興的傳播平台上調適其原有的角色和宣傳模式，並且試圖探索新的路徑來解決上述的雙重矛盾，成為執政黨在新環境下應對危機的迫切需要。

人民日報微博(以下簡稱@人民日報)即在這一背景下誕生，它創辦於2012年7月，是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在中國最重要的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上創辦的社交媒體帳號。<sup>2</sup>其成立雖有偶然因素，但其根本目的則是為了應對Web2.0時代社交媒體興起對傳統傳播體系所構成的衝擊，是對執政黨希望主流媒體進軍新媒體領域，承擔起「黨和政府賦予的輿論引導使命」的號召的響應。人民日報社前社長張研農曾這樣談到人民日報微博的創辦：「要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需按照總書記要求，創新形式、方法和手段，靠輿論引導的創新性和吸引力來贏取關注、凝聚公眾」(陳良飛，2012)。除《人民日報》外，其他中央級的黨媒如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也陸續開設社交媒體帳號，成為貫徹黨中央精神、佔領新媒體陣地進行的嘗試和創新(張瀟、張浩，2012)。

人民日報微博創辦之後在短期內即被認為獲得了較大成功，其粉絲數目在一年之內達到800萬(劉鵬飛、齊思慧，2013)，到2015年9月5日，粉絲數則超過3,800萬，在新浪網發布的《2014媒體行業發展趨勢報告》中，人民日報微博在媒體微博實力榜中高居榜首，超過所有市場化媒體所創辦的微博。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微博也得到高層的肯定，李長春、劉雲山等中央領導人先後考察人民日報微博，對其「做大主流聲音」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這說明，人民日報微博似乎成功地解決了前述黨媒的困境，即，一方面「受讀者歡迎」，另一方面則「滿足黨的要求」，同時完成了這兩個具內在矛盾的使命。

本研究即在這一背景下展開，以人民日報微博為例，它希望觀察的是執政黨在新媒體衝擊的背景下所採取的調適性舉措。通過對它的觀察，本文的目的是考察黨媒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的調適與變遷。具體而言，我們希望探討的是：這一新興的、具有調適性特徵的新興傳播結構究竟是選擇何種策略，如何調適傳統黨媒的宣傳模式？以及，如何解讀和理解這一調適？具體而言，我們將從如下兩個角度來提供解讀：首先，如果確實如一些學者而言，政黨調適是「對社會不同領域的

需求和利益更具有反應性的政治系統的創建」，意味著「從集權到民主的轉變」(Dickson, 2000, p. 5)的話，作為一個頗受民眾歡迎的新興黨媒，@人民日報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執政黨開放和民主化其傳播模式的體現？其次，如上所述，在開放傳播模式，向民意妥協和取悅民眾的同時，黨媒的調適需要面臨為黨行使輿論領導權的使命，二者存在內在角色矛盾，那麼@人民日報究竟是如何解決這一內在衝突？它與1990年代中期以來央視通過焦點訪談節目所採取的路徑和策略是否不同？是否代表了一種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路徑？

## 研究方法說明

我們選擇了兩個議題——拆遷議題及農民工議題——來分析和比較兩個媒體平台的報道表現。之所以選擇這兩個議題進行觀察，是因為這兩個議題都較為典型地體現了中國21世紀以來在追求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整，同時也是這兩年的熱點議題，對其的觀察因而能夠有助於觀察黨媒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社會利益衝突背景下的意識形態、立場和角色選擇。

有關兩個議題的文本是通過如下方式收集得到的：以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為取樣周期，在新浪微博@人民日報中，以「農民工」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在排除雖含有該關鍵詞但並不以其為主要報道對象的文本後，共獲得微博文本118篇(另有長微博7篇作為參考)。以同樣的方法，我們以「拆遷」作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由於此種搜索方法可能會漏掉其他一些沒有採用拆遷作為關鍵詞但同樣是與拆遷事務有關的事件或主題的報道或評論，本文將針對這一期間所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主題做二次搜索，例如，山東平度拆遷縱火案是這一時期發生的一個重大的拆遷衝突案例，我們則用平度作為關鍵詞做二次搜索，篩選出其對於平度事件的所有報道，作為樣本的補充。通過補充之後，我們共獲得@人民日報拆遷議題的總樣本量為109篇。《人民日報》的相關文本來自於相同的取樣周期，分別以「農民工」、「拆遷」為關鍵詞在《人民日報》數字報平台上進行搜索，採用構造周抽樣法，

每3個月抽取一個構造周，兩年共8個構造周，分別獲得111篇農民工議題樣本，104篇拆遷議題樣本。

本文採用了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內容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單篇報道，對@人民日報則體現為單篇的微博文本。我們首先對報道類型進行分析，我們將報道類型分為政策法規解讀、政府報道、典型報道和突發事件報道，前三種對應的是宣傳主義範式，是它的典型形態，後一種則來自於專業主義新聞報道範式。其中，政策法規報道指的是報道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是宣傳或解讀一項或多項國家(或地方)政策，典型案例如〈徵地須守住「非暴力」底線〉，即是對國土部文件〈關於嚴格管理防止違法違規徵地的緊急通知〉的闡釋。政府報道指對具體政府部門的行動和舉措等的報道，如〈國土資源部表示，加強徵地拆遷補償問題督察，加快組建不動產登記局〉、〈中央財政355億元支持棚戶區改造〉等。我們將典型報道定義為「對某個地區或某個人物處理拆遷衝突或農民工問題的成功經驗和方法的報道」，如〈新型城鎮化開啟文登農民新生活〉。一則報道如果既是政府報道，又體現了典型報道的特徵，我們將其計算為典型報道，所以樣本中典型報道的比重較大。一些針對政府的批評報道，如果它是由一個突發事件引發的，我們則將其計算為突發事件報道。信度檢測顯示，編碼員間信度為91.6%。

在修辭策略部分，我們主要採取的是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文本當中對於語彙和句式等的使用。在話語調適的部分，我們則結合了框架分析、話語分析以及內容分析的方法。拆遷議題使用的框架分析方法來自於Entman，按照Entman的定義，框架一般由對問題的定義、(對問題的)因果詮釋、(對問題及造成問題原因等的)道德評價以及針對如何解決問題的建議(problem definition, causal interpretation, moral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這四個成分或環節構成。這一部分因此嘗試從這四個維度對兩個媒體之報道的框架构成。農民工議題則使用了質化的話語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對文本的細緻解讀揭示出文本背後的觀念形態，這種觀念形態往往折射某種價值，並服務於特定的功能。在這一部分，我們也做了一些量化的嘗試，即以單篇報道為單位，歸納每篇報道的話語意涵，進行量化的比較，具體會在

文中介紹。

除此之外，我們也補充使用了檔案研究的方法，收集了發表於業界和學界期刊的多篇關於人民日報微博的報道、訪談和分析類文章，這些文章構成了我們理解和認識@人民日報的背景和基礎。

下文我們將通過三個層面的解析來理解@人民日報所實現的調適。首先，我們將從新聞報道的範式層面解析，並通過與其母報的對比來探討其如何對傳統的宣傳主義範式予以調適；其次我們將轉向分析@人民日報所採用的修辭策略，探討其如何通過採納草根化、高度情感化和偏向性的修辭策略來對傳統上嚴肅權威的修辭策略進行調適；最後我們將從話語層面來探討@人民日報在實質的話語內涵上如何通過吸納和表達民粹話語來實現這一調適。之後我們將對上述層面的調適予以總結和解讀。

### 對宣傳主義範式的偏離

「@人民日報」的調適首先表現在，它並沒有成為《人民日報》的「傳聲筒」。在@人民日報中，只有12%（拆遷議題）和11%（農民工議題）的內容來自《人民日報》主報，其他內容則由其採編人員自採，或是對來自於互聯網論壇或其他媒體內容所進行的編輯。這說明，@人民日報自創立起，就力圖在這個新平台上實踐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與其母報差異化的編輯方針。

這一調適具體體現在對宣傳主義範式的偏離。受到列寧主義新聞理論的影響，中國自建國以來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新聞報道的模式，涉及對新聞業之基本功能的角色認知到日常新聞操作的標準和方法，有學者將其稱為宣傳主義範式或政黨新聞業範式(Zhao, 1996; Pan & Chan, 2003)。儘管這一範式在過去這些年也經歷了緩慢的變遷，但總體而言，其一些共同的基本內涵並無大的改變，這可能包括：以宣傳和教化民眾為主要功能定位，注重媒體的解釋和解讀（政策或社會議題）以及大眾動員的角色(Pan & Chan, 2003)；以正面報道為主，注重對現有權力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張威，1999）；大量應用主題式報道和

典型報道(陳力丹, 1987; 吳廷俊、顧建明, 2001; 陽海洪, 2010; 張威, 2002); 在敘事模式上, 大量採用政府為主角的敘事(李艷紅, 2007); 在文本形態和話語方式上強調嚴肅、正式和權威(李良榮、林輝, 1999)等。

在兩個議題上, @人民日報都體現出了對宣傳主義範式的偏離。這表現在, 構成傳統宣傳主義範式之主體的報道類型, 如政策法規解讀、政府報道和典型報道等都僅佔少數, 在拆遷議題中, 三類報道加總也僅佔報道總數的6.3%, 在農民工議題中, 同樣也僅佔到12.7% (參見表一和表二)。

在減少上述三類宣傳範式之報道類型的同時, @人民日報則增加了另外一種在專業主義範式中得到經常使用的報道類型, 突發事件報道。由於突發事件往往可能損害管理者的形象, 不利於政府對局面的掌控, 帶來所謂「負面效應」, 宣傳主義範式在對突發事件的報道上一直持邊緣化和謹慎採納的態度, 不報或推遲報道(田秋生, 2009)。相反, 在專業主義的新聞範式當中, 突發事件則一直是重要的報道類型, 被認為典型地體現了衝突和及時等新聞價值。因此, @人民日報的調適也可視作是對專業主義範式的有限吸納。在拆遷議題中, 該類型的報道比重達到61.5%, 是其主體類型, 大大超過了《人民日報》(13.5%)。在農民工議題也呈現了相似的模式, 突發事件報道在@人民日報中佔到31.4%, 而《人民日報》只有7.2%, 二者呈現顯著差異(參見表一和表二)。

表一 @人民日報與《人民日報》拆遷議題報道類型分布(%)

類型 \ 媒體	人民日報微博 (n = 109)	《人民日報》(n = 104)
政策法規解讀	2.7	2.9
政府報道	0.9	9.6
典型報道	2.7	46.1
突發事件報道	61.5	13.5
評論	30.3	25.0
其他	1.8	2.9
總計	100.0	100.0

Pearson-chi Square = 82.71, df = 5,  $p < 0.001$

表二 @人民日報與《人民日報》農民工議題報道類型分布(%)<sup>3</sup>

類型	媒體	@人民日報 (n = 118)	《人民日報》 (n = 111)
政策法規解讀		0.8	8.1
政府報道		6.8	17.1
典型報道		5.1	37.8
突發事件報道		31.4	7.2
評論		52.5	25.2
其他		3.4	3.6
總計		100.0	100.0

Pearson-chi Square = 70.21, df = 5, p < 0.001

### 對修辭策略的能動採納與調適

「@人民日報」的另一個顯著舉措是對其所使用的修辭策略予以調適，採用了一種與人民日報具有顯著差異的高度風格化的語言和修辭。由於其大量地應用評論這一文體，這使得它有機會比追求客觀性的「報道」文體更能夠活躍地使用修辭策略，而不必受制於「客觀性」的約束。其採納與調適可概括為兩個方面。首先，與《人民日報》一直使用的、體現在典型黨報上的嚴肅和權威的修辭風格形成差異，@人民日報將其調適為一種草根和親民的修辭風格(陳良飛，2012)。這首先表現在語彙的使用上，它頗為頻繁地將民間日常談話中的非正式詞彙應用在文本寫作當中。由於民間口語表達的詞彙往往具有鮮活的特徵，這往往有助於獲得民眾的歡迎，形成親民風格。例如，當表示對一些地方政府的強制拆遷行為時，會採用「缺德」這種民間語彙。在稱謂上，@人民日報也顯示了與其母報的顯著差異。例如，它經常使用「農民工兄弟」或「兄弟」這一「親密的」口語稱謂來稱呼農民工。相對而言，儘管《人民日報》也嘗試探索使用新的稱謂，但其做法也僅限於「外來建設者」、「進城務工人員」等這一類正式的描述性稱謂。

「@人民日報」還嘗試通過對社交媒體之互動性特徵的採納，運用了對話修辭來塑造這一風格。這尤其體現在評論當中。例如，當描述完一名農民工雪中艱難謀生的畫面，它說「看到如此場景，你心痛了嗎？」；為了表達對農民工春運途中「大包小包」的理解，它說「都是歸

鄉客，誰都不容易，是吧？」。這種對話語態往往存在一個虛擬的對話對象「你」，通過這一方式，它得以將@人民日報塑造為一個人格化的主體，因為與你對應的，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我」。媒體也因此得以脫去其冷冰冰的機構的身份外衣，塑造與讀者（民眾）之間的親密關係。

「@人民日報」所使用的修辭策略的第二個特徵可概括為「去中立化」。中立原則一直居於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是客觀性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本構成的角度，新聞報道中的中立原則則可視為是中立修辭 (the rhetoric of neutrality) 在新聞文本中的充分應用 (Roeh & Cohen, 1992)。所謂「中立修辭」，指的是新聞報道的文本的語言風格應該是非個人的、無個人感情介入的 (unloaded)、非風格化的語言。而與之相對的另一端——「中立修辭」的缺失——則體現為對個人化的、情感化的 (loaded) 和風格化的語言的使用 (Roeh & Cohen, 1992)。

如果說《人民日報》呈現的主要還是「中立化」修辭的話，例如，它的評論往往訴諸「說理」而非情感表達，語彙使用也偏重中立和理性，@人民日報則顯著將其調適為具有濃厚個人化和情感化特徵的「去中立化」修辭。@人民日報正是通過頻繁地使用了高度情感負載和具有明確價值立場的句式來實現了向「去中立化」修辭的調適。例如，它大量使用了感嘆句和反問句等具備表達價值立場功能的語句。如「暴力逼拆何時了！」、「欺負農民工兄弟？絕不放過！」、「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讓施工人員與村民性命相搏？禍起微地補償，這背後有怎樣的隱情？」、「什麼時候，讓我們的農民工兄弟不再如此糾結？」等。除了句式，@人民日報也大量使用高度情感負載的語彙。頻繁出現的此類動詞包括：令人心酸、欲哭無淚、請體諒（表達同情）；震驚（表達驚訝）；令人憤慨、令人髮指（表達憤怒）；點讚、鼓掌（表達讚美）；當思當戒、警醒（表達警示）等。高度情感負載的詞彙還經常被疊加使用，用以加強情感的表達。例如，在報道了一則農民工「怕弄髒公交車，蹭乾淨鞋底才上車」的事件之後，這條微博文本的末尾採用情感負載程度較高的形容詞和動詞疊加使用來表達情感和立場——「質樸的高尚！感動！」在另一則報道了平度縱火案報道的結尾，則採用兩個情感負載程度較高的同義動詞疊加使用來表達其強烈的關注姿態——「關注！關

切!」。另外，👍(讚)、😭(淚)、😡(怒)、😞(悲傷)等在社交媒體上常用的情感表達的符號在這裏也被頻繁使用，用來表達其支持、欣賞或同情等的情感和立場。

我們或許可以從@人民日報如何改編《人民日報》的一則評論來直觀地觀察這一調適：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標題為〈校準徵地糾紛的利益天平〉的評論，在@人民日報上，標題則被改為帶有明確價值傾向的反問句的形式出現，「徵地豈能不顧群眾權利？」，二者的修辭模式差異可見一斑。

### 對話語內涵的調適：民粹主義話語的表達

「@人民日報」的調適不僅僅停留在形式策略上，也進一步體現在實質的話語內涵上。這一話語調適可以用「民粹主義」化來予以概括：通過一系列的意義架構實踐，它傾向於將議題置放在民眾與政府及弱勢群體與主流精英之間的二元對立框架下，並體現出一種對大多數人/普通平民的立場的抽象和無條件的支持。

#### 拆遷議題中的話語調適：從「各打一板」到「板子只打政府」

在在該議題上，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的框架選擇核心地體現在二者對於拆遷的衝突雙方——政府vs.民間——的立場差異上。其中，《人民日報》體現的是「政府民眾各負其責，公共利益受損」的框架，在它看來，拆遷問題既是「政府強權，民權受損」的表現，同時也是「政府作為，刁民鬧事」的表現，這一框架體現出平衡雙方立場的特徵。@人民日報則放棄了這種「平衡」手法，轉向對「民眾立場」的支持，這一框架可以概括為「政府強權，民權受損」。

下表是對二者話語包的歸納和概括：



表三 《人民日報》與@人民日報拆遷議題框架分析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框架	「政府民眾各負其責，公共利益受損」	「政府強權，民權受損」
價值立場	無明確價值立場；政府和民眾「各打一板」	民眾立場，批判矛頭指向政府
對問題的定義	多面向問題：民眾利益受損，民眾「一夜暴富」，刁民騙取補償等	單面向：民眾利益受損
因果解釋	政府民眾各負其責	責任在政府
道德評價	對政府方和民眾方均有中度的道德譴責	僅對政府方有重度道德譴責
解決的建議	極為豐富、細緻的藥方，但主要針對政府	簡略的藥方，針對政府

從上表可以看出，@人民日報將《人民日報》所建立的多面向的、既反映民眾訴求又表達政府訴求、既批評錯誤的政府也批評錯誤的民眾的「各打一板」、雙面平衡的話語「調適」成為了一個單一面向、以反映和表達民眾訴求為主控模式、將批判矛頭直指政府一方的「只將板子打到政府頭上」的具有民粹特徵的框架。

### 農民工議題：正義話語的調適及對人文主義話語的吸納

在農民工議題中，@人民日報所進行的話語調適過程略為複雜。@人民日報進行的第一重調適在於，削減和邊緣化了在《人民日報》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關愛」話語。所謂「國家關愛」話語，指的是由眾多正面和典型報道所建構的典型敘事，例如，國家（包括各級地方政府部門以及官員）總是在及時地回應農民工的需要，幫助其及時解決各種問題：如提供春運期間的車站服務，解決買票難的問題，制定免費加油政策，提供1元錢住宿、幫助其維權討回工資等，扮演關愛者的角色。如前文所述，@人民日報極少採用正面報道和典型報道（僅佔其總體報道數量的5.1%，參見前文表二），因而也對「國家關愛」話語予以了邊緣化。

在「國家關愛」的話語之外，兩個媒體平台都活躍地表達了以平等和關懷為訴求的「正義」話語和人文主義話語。這反映了執政黨在新的

歷史時期有意識回應經濟發展政策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並在話語上對這一「溝壑」予以彌合的表現(Song & Zhang, 2006)。作為黨媒核心的《人民日報》在這一時期體現了高強度地對農民工權利和平等價值的表達。但是，即便在這一話語內部，@人民日報也實現了巧妙的調適。@人民日報的第二重調適體現在將正義話語所針對的領域做出了調整和拓展。這裏，我們借鑒Fraser(1997)區分的兩種(非)正義概念來對這一話語調適過程提供分析。Fraser認為，「社會存在兩種非正義，一種是社會經濟的非正義，這種非正義嵌入於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另一種是文化的和符號的非正義，根源於有關再現(re-presentation)、詮釋和傳播的社會模式。前者可稱為分配的非正義，後者可稱為承認的非正義」。運用這一概念，該議題上的「正義話語」也可定義為「分配領域」以及「(文化)承認領域」的正義話語。為了更好地理解話語調適的過程，我們進一步將分配領域的正義話語區分為兩種類型。我們認為，即便是涉及到社會經濟的正義問題，也同樣存在核心和邊緣之分。也就是說，有一些政策和制度更為關鍵，對於這一社群的經濟利益和福利具有根本性影響；有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則相對不那麼核心，儘管也涉及到這一社群的經濟利益和福利，因而可以將分配領域的正義話語進一步細分為核心領域與邊緣領域的分配正義話語。

我們發現，《人民日報》的正義話語主要體現在核心的分配領域，它針對的是與農民工的社群利益有著核心關聯的公共政策及制度安排，如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及附著之上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醫療制度和維權機制等。其話語則一方面體現為對上述領域不平等現象——如「城鄉分治」、農民工長期處在城鎮的邊緣、被當做廉價勞動力以及合法權益得不到尊重和保護等——予以批判；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對這些領域之平等的倡導，如倡導取消差別待遇、賦予農民與市民同等權利以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化「進程」等。而@人民日報則基本放棄了在上述領域的話語表達，它較少關注戶籍、社會福利和教育等基本制度對農民工平等的影響，與此同時，它則轉向了在邊緣分配領域表達其正義話語。在這一領域，它針對的是不那麼核心或對這一社群而言利益關聯相對較弱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例如，在樣

本期內，@人民日報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網絡購票制度（導致農民工買不到票的問題）和假期安排（忽略了農民工的訴求），這些制度儘管與農民工的經濟利益和福利有關聯，但是相對於前面所言的如戶籍制度等核心的制度安排，其影響的深度要弱得多。@人民日報在這一領域進行了較為活躍的話語表達，例如批判農民工被網絡搶票的技術門檻擋在外面，「高科技竟成剝奪機會的推手」；倡導保障購票權利，實現機會公平等。

「@人民日報」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轉向了承認領域的正義話語，這主要體現為對社會心理和文化認同領域的不公正現象的批評及相關的倡導。Fraser認為，有三種「非正義」現象普遍存在於承認領域，分別是文化統治（一種文化被迫服從於另一種文化的詮釋和傳播模式）、不承認（即通過權威的再現、傳播和詮釋實踐使得一種文化「消失」於無形當中）和不尊重（通過定型化的公共文化再現或通過日常生活互動經常地被貶損）（Fraser, 1997）。對這三個方面的批判和倡導均在@人民日報中有豐富的體現。例如，它針對城市社會將農民工「臨時夫妻」現象詮釋為性道德問題（文化統治）予以了批判，認為這體現的是城市人的立場，倡導應從農民工立場來理解「臨時夫妻」現象，從中認識到農民工的窘迫生活狀況；針對城市市民不承認農民工對城市的付出和價值（不承認）也予以了批判，呼喚「別總在需要時才想起他們」、「沒有他們的城市，挺寂寞」，「他們用自己的髒和累，扮靚了城市，便捷了你我」；對禁止民工入內的廁所標語和不許農民工上公交車（不尊重或貶損）的現象，也通過「他們身上的灰塵不比城市白領的香水卑微」、「誰也不比誰高貴」等方式予以了批判，並倡導平等對待農民工，尊重農民工等。

上述差異可以通過下述量化方式得到更準確描述。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日報做出的調適軌迹：將核心領域的分配正義話語向邊緣領域的分配正義話語及承認正義話語進行調適。

表四 《人民日報》與@人民日報正義話語統計(%)

類型	《人民日報》(N = 37)	@人民日報(N = 39)
分配正義話語(核心領域)	78.4	23.1
分配正義話語(邊緣領域)	2.7	30.8
承認正義話語	18.9	46.1
總計	100.0	100.0

Pearson-chi Square = 24.64, df = 2,  $p < 0.001$

註：二者的言論性文本總數分別為41篇和63篇(包括評論體裁、政策解讀和專訪類報道等)，在除去人文主義話語和「其他」類型話語後，正義話語樣本總數分別為37篇和39篇。

@人民日報所做出的第三重調適是，在上述正義話語之外引入了人文主義話語。如果說前文所述的「正義話語」的關鍵詞是平等、公平和平權，可以概括為平等主義話語的話，人文主義話語的關鍵詞則是關心、理解和體諒，它側重的是針對城市讀者倡導一種對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的溫情與關懷。@人民日報的文本頗多體現了這種人文主義話語，甚至在諸多評論標題當中都得到體現，例如：「假日期間，請更多關心農民工群體」，「(微倡議)請微笑對待農民工」，「(微議錄)為農民工的善良點讚」，「理解萬歲，致敬」等等。

### 何種模式？何種角色的調適？

綜合上文分析，@人民日報不僅在新聞報道範式和修辭模式等形式策略上進行了調適，也在話語的實質內涵上予以了策略性調適。那麼，這一調適的實質為何？如何理解它？其背後折射了傳媒角色的何種調適與變遷？在這一部分，我們將通過總結前文分析並做出延伸闡釋來回應上述問題。

我們認為，@人民日報調適的核心即是對「民意」做出妥協和回應，從這一角度，它反映的是中共傳播模式的開放化和民主化。Chan (2002) 在對1999年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節目和中國的媒體政策的研究中認為，中國執政黨在1990年代已經認識到，向「民意」做出一定妥協對於其建立領導權是必要的。本文的分析則表明，對「民意」做出妥協和回應繼續構成了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調適其傳播模式的基礎。無論是新聞報道之組織模式上的變遷，還是修辭策略、抑或

話語內涵的調適，均可視為執政黨在一定程度上對民意予以有限開放的表現。

不過，上述對民意的開放仍然非常有限，因為它仍然具有明確的邊界。就本文的觀察來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突發事件和評論中對報道對象予以控制和把握，批判僅指向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無論在拆遷議題還是農民工議題都是如此，這與 Song 與 Chang (2012) 關於《人民日報》的分析一致。其次，絕對控制對組織化的集體行動的報道，使得其民本立場只是一種主張而非行動。例如，在突發事件報道上，@人民日報儘管回應民意、將報道焦點投向一些民眾利益受侵害的事件，但它對組織化的行動從不報道，或總是予以負面否定報道。在農民工議題也是如此，有關勞工抗爭的事件從不被納入。考察日期內廣州發生大學城環衛工人抗爭事件，@人民日報即並未站在農民工立場，而是給予了負面報道。這一點也印證了 King、Pan 與 Roberts (2013) 在其網絡審查中得到的結論。<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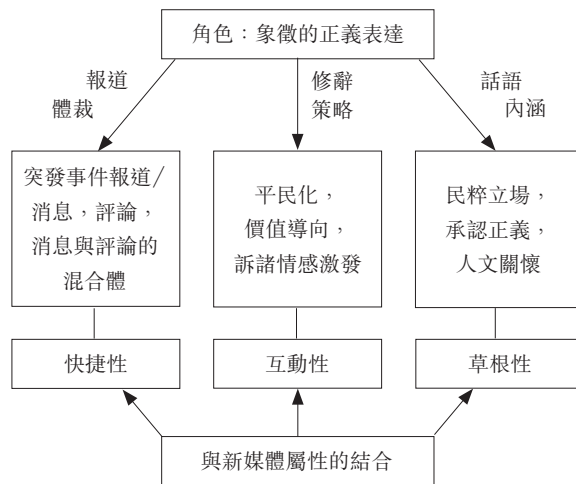
不過，在本文中，我們更願意將這種對「民意」的回應和表達視為是象徵性而非實質。我們認為，上述變遷折射出黨媒在新條件下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義：即，從原先《人民日報》所典型承擔的「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角色調適為以象徵性的「正義表達」作為首要角色，其目的是將黨媒和執政黨的形象建設成為正義的表達與捍衛者。<sup>5</sup> 無論是新聞報道的日常組織模式還是修辭策略，抑或話語內涵的調適，其背後都折射出這一角色定位的變遷：首先，在新聞報道範式上，@人民日報之所以選擇部分地背離宣傳主義範式，轉而對社會問題，尤其是與民眾利益關聯的問題和事件予以充分敏感和迅速關注，大量發表突發事件報道（儘管是簡短的），其目的，除了希望為民眾提供揭露「非正義」的途徑之外，更是希望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反應系統，來表達一種「關懷民意」的姿態；其次，在修辭策略上，@人民日報選擇採取一種平民化的語彙風格、模擬對話的修辭模式，並選擇頻繁使用去中立化的、高度情感化和傾向化的修辭策略，其目的，除了為民間語彙提供一個表達場所，更可詮釋為試圖激發民眾情感，建構與作為讀者的民眾之間的親密關係、將黨媒建構為一個親切關懷並主持正義之公共形象的嘗試，很多時候，其情感激發的任務高於實質的說理和說服；而在話語內涵上，@人民日報之所以選擇將複雜和多

元觸角的拆遷議題簡化處理為表達單一民眾立場、「靶子」指向政府的單一命題；以及，之所以選擇放棄在體現實質正義的核心的公共政策領域表達正義，轉而在實質正義上偏弱的「邊緣再分配」領域以及「承認政治」的領域來表達正義，並吸納以溫情關懷為特徵、具有感召情感的優勢的人文主義話語，均可闡述為@人民日報對民粹主義的運用和吸納，這一調適有助於@人民日報建立一種未必是實質但却形式鮮明的民本立場。

圍繞這一象徵的「正義表達」的角色，並通過與社交媒體屬性的充分互動，@人民日報得以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新聞傳播模式，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這一模式是通過如下過程建構的：首先，在新聞傳播範式的選擇上，它選擇偏離宣傳主義的報道範式，吸納專業主義新聞範式的要素，並將其與新媒體的快捷屬性結合，納入突發事件報道；其次，在修辭策略上，以言論作為主導體裁，能動地實踐了一種草根平民化、情感化和高度傾向化的修辭策略；最後，在實質的話語內涵上，它則將複雜議題置放在民眾與政府，以及弱勢社群與主流社群這樣的二元框架下進行建構，發表支持絕對民本立場的具有民粹主義特徵的「正義話語」等。

圖一是对這一模式的概括：

圖一 「@人民日報」創造的傳播模式



這一模式的重點是訴諸激發情感的「民粹主義」策略：一方面將重點放在民粹主義的話語表達上，如，在新聞文本和話語上表達一種對抽象的、迎合普通民眾立場的「正義」的無條件倡導，另一方面，這一話語策略的訴求重點是對讀者的情感激發，而非理性說服。這一以象徵的正義表達為核心、訴諸情感激發的「民粹主義」策略之所以被選擇，可以被理解為黨媒的從業者對現實情境進行評估後並能動應對的結果，是執政黨在「安全」的範圍內探索加強和贏得執政黨合法性的策略選擇。按照有關威權政體的一般性理論，對一個威權政體而言，初期所獲得的合法性是較高的，但是由於缺乏民主程序來培育持續的共識，合法性往往會逐漸衰落和流失(Nathan, 2003)。中國執政黨在建國後也一直面臨這一難題，這在1989年之後更為嚴峻。因此，執政黨一直將尋找恰當的方式來增加或復興其政權合法性作為其重要任務。本文所研究的@人民日報所創造的傳播模式即可視為這一潮流中的舉措，因為正是通過創造出這種特定的傳播模式，黨媒得以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將自身建構為「直抒胸臆」的正義的闡述者、表達者和捍衛者，為自身打造新型的公共形象，並為執政黨爭取到更多的道德支持。也正是通過這一方式，它得以暫時性化解滿足民眾訴求與滿足黨國訴求二者之間的潛在矛盾，使得黨媒在回應民意的同時，實現了重建文化領導權的角色。這一方式已經顯著區別於傳統宣傳方式，也進一步驗證了中國文化領導權建設的理念逐漸從說教式的宣傳主義(propaganda)向更具隱蔽性、滲透性的霸權主義(hegemony)轉變(Chan, 2002)。

## 結語與討論

通過考察《人民日報》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所創辦的微博帳號「@人民日報」個案，尤其是其在兩個議題上的表現，本文探討了中國執政黨之宣傳體系在新媒體條件下如何調適的問題。本文發現，中國黨媒的傳播調適確實呈現出了新特徵。在新媒體語境的「逼迫」下，作為黨媒重要分支的@人民日報選擇了策略性偏離宣傳主義範式，在新聞報道範式、修辭策略和話語內涵上都進行了調適。

這種調適一方面體現了對民意的回應，是開放和民主化新聞傳播的表現，黨媒恰是通過向社會民意有限開放的方式來實現其滿足民眾訴求的目的，這一調適使得其成功贏得了民眾支持，重新爭取到已經厭倦黨報話語的民眾。但與此同時，它並不因為體現對民意的回應而與黨對意識形態和話語權管控的訴求發生衝突，相反，它通過扮演一種象徵性的正義表達的角色來幫助增強黨的執政合法性，以一種柔性和彈性的方式重建黨媒的文化領導權，這一策略性調適可以視為在二者之間維持了一種暫時的平衡。

這一調適顯示了黨媒在新媒體條件下的創造性發明。如果說90年代中期以來央視通過焦點訪談節目，主要採取的是一種通過「有選擇地吸納輿論監督」策略來實現既滿足民眾訴求又滿足黨國訴求這二者的平衡的話，@人民日報則代表了新媒體語境下新的策略發明。這種策略可以概括為：依托新媒體技術所開關的快捷和互動屬性，以簡短的言論體裁為中介，以塑造象徵的「正義表達」角色為核心，以情感激發為訴求，以民粹話語的表達為出口，是上述方面的策略性組合。這一「配套組合」可以認為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傳播和話語模式。由於@人民日報成功地贏得了讀者的歡迎，如粉絲量突破5,000萬，成為排行第一的媒體微博，在注意力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這一模式因而可以被認為暫時成功地化解了滿足民眾訴求與滿足黨國訴求二者之間的內在衝突。

這一平衡的達成，使得@人民日報扮演的「正義象徵」的角色與人民日報母報作為核心黨報所長期扮演的政策宣導和輿論引導為主的角色相呼應，成為對黨媒核心角色的互補，進而為中共構築了新時代背景下雙層化的立體的傳播體系。@人民日報這一新的話語模式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執政黨致力於建構一種分層化傳播體系的努力。當傳統官方話語體系受到網絡輿論場衝擊之時，尋找一種代表官方權威的「黨的喉舌式」傳播與代表民眾意志的「人民的喉舌」式傳播之間的平衡，也許是執政黨不得已的選擇。這一雙層的傳播體系將可能比單一的以訴諸權威和宣傳為導向的傳播體系更可能幫助執政黨建立領導權，並增加這個政體的彈性。

如Nathan (2003)所言，大眾傳媒制度應該視為有關政治合法性的



重要的制度安排，構成研究威權政體之彈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認為，與市場化的媒體有所區別，核心黨媒可能更應視為這一制度的核心，因為它身份的特殊性，它可能更直接作用於執政黨之政治合法性的建設，從而成為增強今天中國威權政體彈性的重要環節，使得其一方面避免從「總體主義」走向崩潰，但另一方面也阻礙其向民主政體轉型。從@人民日報所取得的成功，如受讀者歡迎的程度來看，黨媒的這一策略性變遷可能確實有效。但是，這種有效性是否可持續仍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理論上說，@人民日報目前實現的這種平衡仍然有可能隨著外在條件的變遷而被打破，黨的需求和注意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等都可能導致平衡被打破，進而導致模式的進一步變遷或角色重新回歸。例如，之前央視的「焦點訪談」節目就在政權調適與收縮的再循環中重新回歸傳統角色，不再能夠滿足民眾訴求，因而也不再能夠承擔增強政體彈性的角色。而從另一方面看，@人民日報所採取的模式在幫助增強執政黨合法性的同時，由於訴諸民粹主義，也可能為執政黨帶來新的治理危機。這些都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並應該成為接下來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重點。

本文的主要不足在於未能對人民日報微博的創作者進行深入訪談，其分析主要依賴於對文本的解讀，若能得到前者的印證將更扎實。但是，鑒於當前採取田野考察或深入訪談等方式來獲取瞭解黨媒真實的新聞生產邏輯仍然困難重重，本文所採取的「文本分析」方法仍然有其價值。另外，本文所選擇的兩個議題未必有充分的代表性，因此，我們從對兩個議題上的表現所得出的結論可能未必能推論到@人民日報在其他議題上的表現。事實上，@人民日報完全有可能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在不同的議題領域設立差異化的編輯方針。因此，更完整的認識可能取決於下一步將視野擴展到更廣闊的議題和事件。但即便如此，本文的分析在部分議題領域仍然是成立的。下一步，就@人民日報這個案例而言，我們希望繼續擴大觀察的議題範圍和時間範圍，例如，可以擴大觀察其在其他類型之議題如反腐以及在新近一些重大突發事件中的表現，以對@人民日報所形成的傳播模式進行更立體的認識，並希望可以繼續觀察目前這種實現了暫時平衡的傳播模

式在歷時上是否可持續？哪些條件將打破這一平衡？其次，關於黨媒在新媒體語境下的傳播模式，新的案例仍在不斷湧現，例如，由上海市政府投入巨資打造，並背負黨媒在新媒體平台上之輿論引導功能的「澎湃新聞」就是其中一個代表，對這些「新黨媒」的考察都將構成下一步研究的重要主題。探討的核心仍然是，黨媒的調適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 註釋

- 1 在中國的報紙體系中，各級黨委都擁有自己的黨委機關報，這就是通常被所說的黨報，此類黨報往往被定位為各級黨委的喉舌，主要承擔宣傳政黨方針政策的任務。在類型上，一些學者將其在類型上與政府的機關報、對象報和市場化報紙（往往是黨報所辦的子報）相區別（Zhao, 1998）。本文所說的黨媒概念從黨報概念延伸開來，它涉及不同的媒體類型，如國家級的電視、電台和通訊社等。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等都是我們所說的黨媒的範疇。黨媒往往在定位上被認為需要主要承擔黨所賦予的任務，因而也更直接受到黨的干預。
- 2 @人民日報的地位不同於《人民日報》的子報，後者在編輯運營上往往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人民日報則不同，它內在於《人民日報》，其編輯和運營都由《人民日報》專門抽調人力組成，並不具有獨立的地位。這一結構性位置說明，@人民日報就是黨媒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研究目的，對其的研究有助於認識新媒體語境下黨媒之變遷。
- 3 在抽樣期間的樣本中，得到最頻繁報道和解釋的政策包括2014年7月30日公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以及2014年2月26日〈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等。政府報道主要表現為，各級政府部門圍繞農民工問題開展的工作會議、領導講話、調研考察等，如〈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典型報道則主要表現為，各地農民工市民化、討薪維權等先進經驗推廣，以及關懷農民工的典型個體塑造，如〈寧夏農民工資銀行直接付〉。
- 4 Chan (2002) 在對央視焦點訪談節目的研究中發現，焦點訪談控制了批判矛頭的指向，只指向地方政府而非中央；Song與Chang (2012) 在研究了《人民日報》有關農村話語的十年變遷中發現，人民日報在關於農村發展問題的歸因上，更多將問題歸因於地方和基層政府而非中央；King、Pan與

Roberts (2013) 等對大陸網絡審查系統的研究發現，中國網絡審查機制的焦點並非批判，而是行動和組織。從本文來看，當黨媒嘗試打開批判之窗，遵循的仍然是這一原則。

- 5 本文所界定的黨媒的這一角色迥異於傳統黨媒的宣傳角色，甚至也區別於一般所說的「輿論引導」的角色。因為這一角色的主要作用是服務於一種更廣義的說服，力圖說服民眾重新建立對黨媒以及對黨作為正義捍衛者的信心，而非在具體的政府議題中行使具體的輿論引導作用。例如，本文所考察的農民工議題中的戶籍制度改革，是中央這一時期針對農民工群體最重要的工作議程，可是@人民日報則選擇偏離了這一角色，並未對這一制度的改革推進做充分報道，從而並未在這一議題行使輿論引導的角色。從本文來看，黨媒願意「出讓」具體的輿論引導角色，轉向對「象徵正義表達」的角色，是因為前者必然導致失去讀者，而後者則有可能重新贏回讀者，並服務於它加強合法性和重建文化領導權的目的。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田秋生 (2009)。〈市場背景下制約黨報新聞生產的三重邏輯〉。《國際新聞界》，第2期，頁69-74。
- Tian Qiusheng (2009). Shichang beijing xia zhiyue dangbao xinwen shengchan de sanchong luoji. *Guoji xinwenjie*, 2, 69-74.
- 李良榮 (1995)。〈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新聞大學》，第1期，頁3-8。
- Li Liangrong (1995). Shiwunian lai xinwen gaige de huigu yu zhanwang. *Xinwen daxue*, 1, 3-8.
- 李良榮、林輝 (1999)。〈試析雙重壓力下黨報面臨的困難及其對策〉。《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89-95。
- Li Liangrong, Lin Hui (1999). Shixi shuangchong yali xia dangbao mianlin de kunnan jiqi duice. *Fud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3, 89-95.
- 李艷紅 (2007)。〈新聞報道常規與弱勢社群的公共表達——廣州城市報紙 (2000-2002) 對「農民工」報道的量化分析〉。《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16-123。
- Li Yanhong (2007). Xinwen baodao changgui yu ruoshi shequn de gonggong biaoda—Guangzhou chengshi baozhi (2000-2002) dui nongmingong baodao

- de lianghua fenxi.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116–123.
- 沈大偉 (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Shen Dawei (2012). *Zhongguo gongchandang: shousuo yu tiaoshi*.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 何舟 (1998)。〈從喉舌到黨營輿論公司：中共黨報的演化〉。《中國傳媒新論》。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
- He Zhou (1998). *Cong houshe dao dangying yulun gongsi: Zhonggong dangbao de yanhua*. *Zhongguo chuanmei xinlun. Xianggang:Taipingyang shiji chubanshe*.
- 南振中 (2003)。〈把密切聯繫群眾作為改進新聞報道的著力點〉。《中國記者》，第3期，頁4–9。
- Nan Zhenzhong (2003). *Ba miqie lianxi qunzhong zuwei gaijin xinwen baodao de zhuolidian*. *Zhongguo jizhe*, 3, 4–9.
- 祝華新 (2013)。〈微博國家隊：改善網絡輿論生態——@人民日報開通一周年輿情解讀〉。《新聞戰線》，第8期，頁25–27。
- Zhu Huaxin (2013). *Weibo guojiadui: gaishan wangluo yulun shengtai—@renmin ribao kaitong yizhounian yuqing jiedu*. *Xinwen zhanxian*, 8, 25–27.
- 莊永志 (2013)。〈《焦點訪談》何以失焦〉。《青年記者》，第21期，頁9–12。
- Zhuang Yongzhi (2013). *Jiandian fangtan heyi shijiao*. *Qingnian jizhe*, 21, 9–12.
- 張威 (1999)。〈中西比較：正面報道和負面報道〉。《國際新聞界》，第1期，頁49–57。
- Zhang Wei (1999). *Zhongxi bijiao: zhengmian baodao he fumian baodao*. *Guoji xinwenjie*, 1, 49–57.
- 張威 (2002)。〈典型報道：淵源與命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期，頁38–49。
- Zhang Wei (2002). *Dianxing baodao: yuanyuan yu mingyun*.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2, 38–49.
- 張瀟、張浩 (2012)。〈微博輿論引導的現狀及其策略創新探析〉。《電影評介》，第2期，頁81–83。
- Zhang Xiao, Zhang Hao (2012). *Weibo yulun yindao de xianzhuang jiqi celve chuanguangxin tanxi*. *Dianying pingjie*, 2, 81–83.
- 陳良飛 (2012年7月30日)。〈人民日報微博誕生始末：年輕編輯建議開設〉。上網日期：2015年1月10日。取自 <http://news.sina.com.cn/m/2012-07-30/061924868894.shtml>。
- Chen Liangfei (2012, July 30). *Renmin ribao weibo dansheng shimo: nianqing bianji jianyi kaishe*. Retrieved on January 10, 2015 from <http://news.sina.com>.

cn/m/2012-07-30/061924868894.shtml.

陳良飛 (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報》微博親民、清新表達方式獲網民積極反應〉。上網日期：2015年8月21日。取自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7/31/16422350\\_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7/31/16422350_0.shtml)。

Chen Liangfei (2012, July 31). Renmin ribao weibo qinmin qingxin biaoda fangshi huo wangmin jiji fanying. Retrieved on August 21, 2015 from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7/31/16422350\\_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7/31/16422350_0.shtml).

陽海洪 (2010)。〈論民粹主義與典型報道的起源——以「吳滿有」報道為例〉。《國際新聞界》，第4期，頁70–75。

Yang Haihong (2010). Lun mincui zhuyi yu dianxing baodao de qiyuan—Yi Wu Manyou baodao weili. *Guoji xinwenjie*, 4, 70–75.

黃典林 (2013)。〈從「盲流」到「新工人階級」——近三十年《人民日報》新聞話語對農民工群體的意識形態重構〉。《現代傳播》，第9期，頁42–48。

Huang Dianlin (2013). Cong mangliu dao xin gongrenjieji—jin sanshinian renmin ribao xinwen huayu dui nongmingong qunti de yishi xingtai chonggou. *Xiandai chuanbo*, 9, 42–48.

劉朋 (2013)。〈新媒體時代執政黨的自我調適〉。《理論視野》，第7期，頁42–46。

Liu Peng (2013). Xinmeiti shidai zhizhengdang de ziwo tiaoshi. *Lilun shiye*, 7, 42–46.

劉梓良 (2001)。〈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成果——寫在〈全國省級黨報現狀與改革途徑新探索〉問世之際〉。《新聞記者》，第11期，頁26–30。

Liu Ziliang (2001). Yixiang juyou zhongyao yiyi de yanjiu chengguo—Xiezai quanguo shengji dangbao xianzhuang yu gaige tujing xintansuo wenshi zhiji. *Xinwen jizhe*, 11, 26–30.

劉鵬飛、齊思慧 (2013)。〈人民日報法人微博一周年數據分析〉。《中國報業》，第15期，頁29–31。

Liu Pengfei, Qi Sihui (2013). Renmin ribao faren weibo yizhounian shuju fenxi. *Zhongguo baoye*, 15, 29–31.

趙建民 (2010年4月18日)。〈組織內卷與列寧式政黨的調適與變遷〉。上網日期：2014年10月29日，取自：<http://www.docin.com/p-50301022.html>。

Zhao Jianmin (April 18, 2010). Zuzhi neijuan yu lieningshi zhengdang de tiaoshi yu bianqian. Retrieved on December 29, 2014 from <http://www.docin.com/p-50301022.html>.

趙鼎新 (2013年7月15日)。〈績效合法性、國家自主性與中國經濟發展〉。上

網日期：2014年11月2日，取自：[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1587688.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1587688.html)。

Zhao Dingxin (July 15, 2013). Jixiao hefaxing、guojia zizhuxing yu zhongguo jingji fazhan. Retrieved on November 2, 2014 fr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1587688.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1587688.html).

潘祥輝(2012)。〈論傳播失靈、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的三角關係——一種信息經濟學的考察視角〉。《現代傳播》，第2期，頁51-56。

Pan Xianghui (2012). Lun chuanbo shilling, zhengfu shilling ji shichang shiling de sanjiao guanxi—yizhong xinxi jingjixue de kaocha shijiao. *Xiandai chuanbo*, 2, 51-56.

羅以澄、姚勁松(2012)。〈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演進中的媒介角色變遷〉。《當代傳播》，第4期，頁15-18。

Luo Yicheng, Yao Jinsong (2012).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zheng hefaxing yanjin zhong de meijie juese bianqian. *Dangdai chuanbo*, 4, 15-18.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Chan, A. (2002). From propaganda to hegemony: *Jiaodian Fangtan* and China's medi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30), 35-51.

Dickson, B. J. (2000).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5(4), 517-540.

Esarey, A., & Xiao, Q. (2011).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5), 298-319.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London: Routledge.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Lee, C. C. (1990).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6).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4), 581-602.

Nathan, A.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17.

Noesselt, N. (2014). Microblogs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s governance strategy. *Governance*, 27(3), 449-468.

Pan, Z. D.,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649-682.

Roeh, I., & Cohen, A. A. (1992). One of the bloodiest day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pen and close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2), 42-55.

- Song, Y. Y., & Chang, T. K. (2012). Legitimizing ruptures of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Party press discourse on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1997–2006.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Politics*, 17(3), 316–340.
- Wu, G. (2000). One head, many mouths: diversifying press structures in reform China.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pp. 45–67).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Xie, Y. (2008). Party adapt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authoritarian China. *Issues & Studies*, 44(2), 79–102
- Zhang, X. L., & Guo, Z. Z. (2012).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The politics of dialects in TV program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300–315.
- Zhao, Y. Z. (1996). Toward a propaganda/commercial model of journalis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Youth New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8(3), 143–157.
- Zhao, Y. Z. (2000).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party st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3–26.

## 本文引用格式

- 李艷紅、龍強 (2017)。〈新媒體語境下黨媒的傳播調適與「文化領導權」重建：對《人民日報》微博的研究 (2012–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39 期，頁 157–187。